

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

宋晓玲

[内容摘要] 本文基于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视角,运用泰尔指数对我国各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测算,进而采用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度数据构建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控制变量中,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财政支出等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很显著。因此,我国应确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和总体思路,重塑发展路径,打造多方合作与相互支持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圈,积极发挥其他因素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作用,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平衡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0.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7)06-0014-12

一、研究背景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在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会上被提出,旨在解决当时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逐渐扩大、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以及饥饿持续蔓延等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二元对立的城乡经济结构长期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困扰,我国一直尝试解决农村、低收入地区的金融服务缺失问题,致力通过发展普惠金融缓解城乡收入不均衡问题。然而,依托实体网点向普惠群体提供金融服务,需要支付相对高昂的业务成本,却往往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盈利驱动机制产生冲突,这也是当前传统金融机构对普惠金融业务“外热内冷”的主要诱因。2016年9月《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正式公布,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规则支撑。“数字普惠金融”是指以数字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实现形式,中国的电子商务、电子支付技术业务增长势头全球领先,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凭借数字技术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弯道超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包容性增长不无可能。

作者简介:宋晓玲(1972—),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sxlhfr@sinac.edu.cn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村镇金融服务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与示范”(2014BAL07B03);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17YJ04004)。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有关金融、经济和城乡发展关系的问题早有大量研究。Mckinnon 和 Show(1973) 最早提出：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金融抑制，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信贷资源配置失衡、制约经济增长。^[1]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 1955 年提出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变化的“倒 U 型”假说(Moran, 2005)。^[2]Greenwood 和 Jovanovic(1990)在 Kuznets 假说的基础上，首次构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动态模型，证实了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服从“倒 U 型”曲线。^[3]Dollar 和 Kraay(2002)在“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一文中对 92 个国家的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重要因素。^[4]

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之上，关于普惠金融与减贫、促进收入增长的研究也逐渐成熟。Geda 等(2006)利用埃塞俄比亚 1994—2000 年面板数据，发现通过信贷、储蓄等金融服务的延伸，普惠金融可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5]Bittencourt(2010)以巴西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提高低收入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和服务范围，有利于改善 20% 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现状。^[6]Sarma(2010)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构建方法，采用多个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体系，衡量了不同国家的普惠金融水平。^[7]

近年来，技术发展、产品创新给普惠金融带来新的研究视角。世界银行在《全球金融发展报告 2014》中提出：新的技术为推广普惠金融带来希望。移动支付、移动银行以及生物识别借款人身份等技术创新，既加强了金融安全，又让人们可以低价、高效地享受金融服务。2016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 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中指出：数字技术、互联网的发展，通过包容、效率和创新为贫困及弱势人口提供了无法企及的发展机会。

（二）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国内数字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和发展的时间还较短，从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还非常少。但是，关于传统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已经逐渐成熟，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理论也源自对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理论的挖掘。所以，本文从四个主要方面梳理现有文献：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互联网金融以及数字技术对普惠金融的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

在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上，张小林、徐敏(2014)运用 VAR 模型和 1985—2012 年数据，实证研究普惠制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二者的关系，发现普惠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一定程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效果并不明显。^[8]

在互联网金融以及数字技术对普惠金融的推动上，王海军等(2014)指出，近年来国内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与普惠金融的政策背景、金融抑制的市场体制以及现代技术革命紧密相关。^[9]契合互联网金融和数字货币发展背景，焦瑾璞等(2015)分析了数字货币在增加金融

服务的覆盖面、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以及提升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0]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并运用我国2004—2014年相关数据，张晓燕（2016）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金融发展可以明显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又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1]

单从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看，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给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具体内容：涵盖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支付、转账、储蓄、信贷、保险、证券、财务规划和银行对账服务等），通过数字化或电子化技术进行交易，如电子货币、支付卡和常规银行账户。由盈灿咨询、网贷之家、第一财经陆家嘴联合发布的《2016数字普惠金融白皮书》系统地阐述和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概念，并划分为传统金融机构对原有产品的数字创新、新兴的类金融机构提供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两种数字普惠金融门类。2016年7月，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以蚂蚁金服提供的数据为基础，发布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5年）》，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了全面、完整构建和阐释，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较权威的数据依据。^[12]

在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学者展开广泛研究，得出结论也有所差异。陆铭、陈钊（2004）基于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验证了城市化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作用，同时发现经济开放和政府参与等因素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3]唐礼智等（2008）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区域对1987—2006年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服从Kuznets“倒U型”曲线条件。^[14]胡荣才等（2011）选取五大类、十三个指标变量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采用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化、GDP增长率和城乡金融规模等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而经济对外开放度和农村非农产业比重抑制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15]选取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王修华、邱兆祥（2011）实证发现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会让城乡收入差距增大，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则对其有抑制作用，认为发展具有包容性质的农村金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6]胡晶晶、黄浩（2013）的研究表明：1997年以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偏向型财政政策的改善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等因素扩大了城乡差距。^[17]基于市场竞争、金融排斥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作用机制问题，薛宝贵、何炼成（2016）利用1999—2009年中国各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市场竞争使得包括金融资源在内的资本要素日益向城市集聚，由于缺乏有效的金融服务工具，使得农户存款不能就地顺畅地转化为农户贷款，产生金融排斥，进而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8]

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的迅速发展，也对解决农村、低收入地区的金融服务缺

失、收入不均问题有着愈发显著的效果,探讨这一影响对研究我国城乡均衡发展问题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对于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体系逐渐成熟;而由于发展时期短、可参考数据缺失,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还相对匮乏。因此,本文将对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希望本文的研究结论能有助于探索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为我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研究城乡均衡发展问题提供参考价值。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分析

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金融机构经营成本,大大提升了金融服务的触达能力;触达性的提高又可以有效扩大用户群,促进金融服务需求向“尾部”移动;而风险的有效控制又为拓展尾部市场奠定了征信基础,降低了风险控制成本,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数字普惠金融在这三个维度的耦合作用下,又共同发挥了“长尾”作用,解决了一直以来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矛盾,使金融服务更加普惠。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降低门槛效应、缓解排除效应和减贫效应,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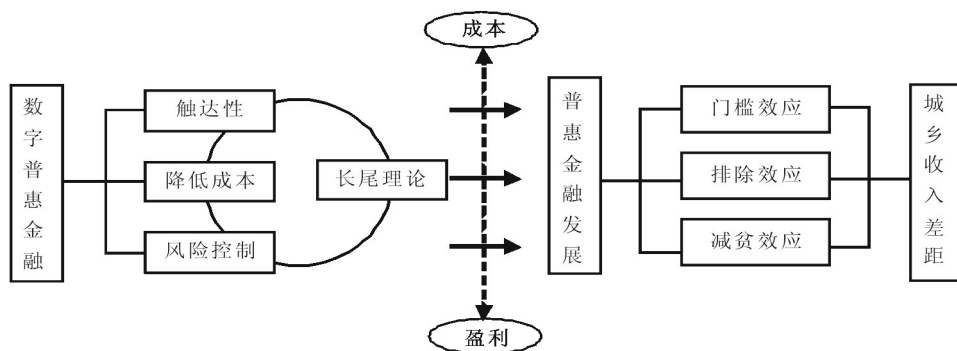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机理图

(一) 提升金融服务触达能力

数字技术的运用使金融服务的可触达性大幅提高,移动互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可触达金融的方式,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获取用户的成本。在2016年“双11”购物节,通过阿里巴巴平台销售1207亿元的产品,其中81.87%通过移动支付完成。支付工具继续跟随商业和消费方式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真正意义上的“无现金时代”或将到来。移动支付使得地理限制不再是阻碍金融服务覆盖范围扩大的瓶颈,金融服务的可获得能力被大大提高。传统金融机构依靠实体网点的覆盖程度实现范围的扩大,而出于盈利的考量,高成本往往又会让其对农村、低收入地区望而却步。通过移动端口等数字技术手段,这些地区的居民完全可以在自己生活

的空间范围内完成交易、成为金融服务的获得者，不再受地理范围的局限。

（二）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使一些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在移动手段支付、业务处理的成本降低变得十分必要。蚂蚁金服发布的数据显示，云计算的成本和传统IT的成本之比是1:10，相较而言降低了90%的成本。而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应用，支付宝单笔支付成本在几年前就已经降到0.02元，以后还可能保持降低趋势。数字技术在平台的运营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效率的大幅提高成功降低了人工参与度，减少了许多运营支出，这会使得平台的成本、运营效率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结合，使得大大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整体成本，也使得传统金融服务所不能覆盖的人群——小微企业、农村居民、贫困社区等，都可能成为数字普惠金融的获得者乃至服务核心群体。

（三）增强风险控制能力

信息收集与处理是风险甄别的基础，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数字技术手段的运用，正深刻改变着收集与处理数据的方式方法，大大提高了数据处理方式和甄别风险的效率，为构建包括普惠群体在内的全面征信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征信体系的建立可以避免信贷交易中的风险，给需要资金的小微企业、农村低收入人群在进行贷款提供一个有效、健全的平台，投资者可以通过其信用记录或其他信息甄别金融投资的风险，合理选择，而不是将所有低收入者排除在外。这不仅降低了排除效应的影响，大大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还将金融的门槛按风险、信用级别合理划分，而不是依高、低收入人群和地区进行划分，减弱了不平等因素，同时也必将促进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四）低成本服务长尾客户

长尾(The Long Tail)这一概念是由“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2004年10月的“长尾”一文中最早提出来的，用来描述诸如亚马逊和Netflix之类网站的商业和经济模式。长尾理论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关系，过去企业只能关注重要的客户，即用正态分布曲线来描绘的“头部”客户，往往忽略了处于正态分布曲线“尾部”、需要更多精力和成本才能关注到的大多数客户。而在网络时代，由于经营业务、关注客户的成本大大降低，有可能以很低的成本关注正态分布曲线的“尾部”，甚至这些“尾部”叠加产生的总体效益会超过“头部”客户。^[19]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20%的头部客户为商业银行带来的利润十分有限，而80%的中小客户通过叠加效应正是银行要深挖的蓝海市场。互联网和移动金融依靠其低门槛、广覆盖、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使得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大大降低。网络信息技术使得固定成本下降，盈亏平衡点向长尾边界右端扩展，使得原本不在商业银行服务领域的普惠金融客户群体纳入进来。

（五）普惠金融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效应

城乡、贫富群体在金融服务可得性方面存在很大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则有可能为这一现状带来革命性的转变。普惠金融能发挥地理区域的渗透性、使用有效性和产品基础性，在以上三条途径中实现突破，削弱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消极影响，首先缩小城乡金融服务的差距，进而通过普惠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 降低门槛效应。享受金融服务需要一定的成本，低收入者由于自身经济实力弱，缺乏支付能力，无法都像高收入者一样满足金融服务的获得条件。农村地区信用环境较差，农村居民可供抵押资产少，贷款风险大，无法满足一般银行信贷服务的提供条件。“门槛”因此产生。高、低收入人群享受的投资回报不同、收入不同，收入差异产生。农村地区发展也因此被限制，不利于低收入者增收；这种限制还会形成恶性循环，使收入差异被越拉越大。以商业银行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出于成本和盈利考量，无法解决门槛效应带来的问题，金融发展便通过门槛效应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金融机构通过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为农村和低收入地区及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将会降低门槛效应。

2. 缓解排除效应。基于降低成本、风险管控以及扩大盈利的目的，许多银行纷纷关闭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分支机构，将农民直接排除在金融机构的覆盖范围外，金融排斥由此产生。同时，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资本要素由于城乡交易成本差异、可抵押资产产权差异、农业的贷款风险和低附加值四方面原因不断向城市聚集。^[18]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资本要素不断吸引劳动力等其他生产要素进一步向城市聚集，致使农村资本外流，严重影响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依托普惠金融业务，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则能够有效地缓解金融排斥带来的负面作用。

3. 发挥减贫效应。减贫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体现在微型金融和金融服务覆盖面两方面上。一是最初为解决发展中国家金融垄断，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小额信贷成为普惠金融发展主要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微型金融将原本被排斥在金融服务范围外的农村低收入者重新纳入服务群体，为其生产、发展创造条件而助其摆脱贫困。二是农村金融发展通过“涓滴效应”发挥金融功能，刺激经济增长达到减贫目的，间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16]也就是说，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增加可使区域经济发展、就业水平获得提升，可助低收入者脱离贫困陷阱，为其创造一个更好地获取金融服务的环境、创造更多机会，助其累积财富。金融机构开发适应性强的新产品、提高金融产品及服务使用的有效性，能帮助居民增收、降低贫困，发挥减贫效应。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拟采用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截面和时间序列的面板数

据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 被解释变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标

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常用的指标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数据易获取且直观,是国内大多学者在文献中运用最多的方法,但是这种计算方法不能体现城乡人口比重变化造成的影响;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相较而言更复杂、更严谨,但基尼系数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不同阶层人群之间进行分解,度量的是总的收入差距,且对中间阶层收入变化比较敏感;而能体现城乡收入两端变动的泰尔指数计算更具统计意义。

泰尔指数考虑的人口变动因素,能将城乡收入差距分解为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因此,本文选用泰尔指数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该结果越大,表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所使用计算公式为:

$$GAP = \sum_{i=1}^2 \left(\frac{Y_{(i,t)}}{Y_t} \right) \times \ln \left[\left(\frac{Y_{(i,t)}}{Y_t} \right) / \left(\frac{X_{(i,t)}}{X_t} \right) \right] \quad (1)$$

注: $i=1$ 代表城镇, $i=2$ 代表农村。 $Y_{(i,t)}$ 表示第 t 年城镇或农村可支配收入, Y_t 代表第 t 年总可支配收入; $X_{(i,t)}$ 表示第 t 年城镇或农村人口数, X_t 代表第 t 年总人口数。

2013年,统计局更新了计算城乡居民收入的方法,使用新口径计算居民收入,并将“农村人均纯收入”这一指标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统一,变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种统计方式并行两年,而后使用新口径。使用新口径下的数据这使得计算结果在量纲上与之前稍有不符,为了使泰尔指数计算所得数据在量纲上保持一致,但又保持应有趋势,对2011年、2012年使用老口径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进行比例上的调整,然后进行计算。

(二)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016年7月,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运用蚂蚁金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海量数据,编制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5)”。从覆盖广度(账户覆盖率)、使用深度(支付业务、信贷业务、保险业务、投资业务、征信业务)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便利性、金融服务成本)三个一级维度,选取一共包含24个指标建立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编制了全国31个省市、337个地级以上城市以及1754个县三个层级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数据基础。^①本文借鉴其研究结果,选取其通过方法测算出的2011—2015年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逆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由于该指数较本文选取的其他指标数值过大,不在同一量纲上,因此,使用该指数占100的百分比值为原始数据。

(三) 控制变量

1. 城镇化率URBAN。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曾经大大限制了中国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曾经被用来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完善,劳动力的流动性加强,这会加剧城市就业市场的竞争,降低平均工资,同

时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陆铭、陈钊(2004),田杰、陶建平(2011),王修华等(2011),胡晶晶等(2013),薛宝贵等(2016)经过实证分析均得出城镇化水平的上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缩小作用的结论。^{[13][20][16][17][18]}故本文城镇化率URBAN用城镇年末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并预期这一变量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 产业结构IS。我国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是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并没有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产量的提升中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除了城市化,劳动力也会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发生转移,唐礼智等(2008),徐敏、张小林(2014)等均经过实证分析得出了非农业比重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这一结论。^{[14][18]}胡荣才等(2011)持相反观点,认为农业生产落后且农产品价格低等因素使得农民收入水平和涨幅都逊于城市居民,但其实证结果与农村非农产业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同向影响作用这一假设不符。^[15]因此,本文产业结构IS选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预期其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作用。

3. 对外开发程度OPEN。陆铭、陈钊(2004),徐敏、张小林(2014)等认为对外开放程度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并进行了实证验证。^{[13][8]}而薛宝贵、何炼成(2016)则持不同意见,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相反观点。^[18]有关这一变量的影响有待检验。本文经济对外开放程度OPEN选用外商投资进出口总额(按当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折算)占GDP的比重表示。

4. 财政支出偏倚与财政支出结构改善。财政支出偏倚度过大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而财政支农支出比重的提高则有可能扭转和修正这一趋势,对弱化城乡收入差距起到积极作用。故本文选取财政支出占GDP比重FE表示财政支出偏倚情况,用财政支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例AFE表示财政支出结构改善情况,并预期财政支出FE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为正向,系数应为正;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改善情况AFE影响系数可能为负。财政支农支出数据使用地方财政农林水事物支出计算。

5. 经济发展水平RGDP。根据Kuznets“倒U型”假说,城乡收入差距应随经济增长先增大、后减小。有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会使穷人从中获得巨大好处,实现减贫,^[1]但也有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和收入均衡分配同步实现。可见,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肯定的,但其影响方向如何,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是否已到达“倒U型”曲线的拐点,还有待验证。本文中经济发展水平RGDP选用当地人均GDP表示。

四、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均衡影响:平衡面板估计

(一) 面板单位根检验

运用常用的五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数据平稳定,对原始数据进行第一次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GAP、DIFI、OPEN、RGDP都是一阶平稳的,URBAN、FE、AFE和IS一阶不平

稳。对其进行对数处理后进行第二次检验,结果显示全部平稳。其中,AFE使用原始数据乘以100后再取对数处理。所有变量都基本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可以视为平稳序列(见表1)。

表1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英文字符	平稳性	检验类型	显著性
城乡收入差距	<i>GAP</i>	通过LLC、ADF、PP检验	(0, 0)	全部***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i>DIFI</i>	通过LLC、IPS、ADF、PP检验	(c, 0)	ADF**; 其余***
人均GDP	<i>RGDP</i>	通过LLC、IPS、ADF、PP检验	(c, 0)	全部***
财政支出偏倚	<i>FE</i>	通过LLC、ADF、PP检验	(0, 0)	全部***
财政支出结构改善	<i>AFE</i>	通过LLC、IPS、ADF、PP检验	(c, 0)	ADF**; 其余***
产业结构	<i>IS</i>	通过LLC、ADF、PP检验	(0, 0)	全部***
对外开放程度	<i>OPEN</i>	通过LLC、IPS、ADF、PP检验	(c, t)	IPS、ADF**; 其余***
城市化水平	<i>URBAN</i>	通过LLC、ADF、PP检验	(0, 0)	IPS*; 其余***

注: 检验类型(c,t)中的“c”代表截距项,为0表示不含截距项;“t”代表趋势项,为0表示不含趋势项。***、**、*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二) 平衡面板估计

基于前面各部分的分析,初步设定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GAP_{it} = \alpha_i + \beta_1 DIFI_{it} + \beta_2 RGDP_{it} + \beta_3 FE_{it} + \beta_4 AFE_{it} + \beta_5 IS_{it} + \beta_6 PEN_{it} + \beta_7 URBAN_{it} + U_{it}, \quad (2)$$

$$i = 1, 2, \dots, 31; t = 2011, 2012, \dots, 2015$$

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运用面板数据逐步回归法,即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变量。首先剔除最不显著的变量“产业结构”,回归结果见表2中的模型1;随后剔除变量“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回归结果见模型2;最后剔除变量“人均GDP”(显著性水平为12%),回归结果见模型3。

表2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平衡面板估计

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均衡指数						
模型编号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解释与控制变量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常数项	0.0666***	4.1810	0.0766***	5.9046	0.0693***	5.7406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0.0044***	-3.7337	-0.0039***	-3.6084	-0.0050***	-6.0559
人均GDP	-0.0140	-1.2270	-0.0169	-1.5298		
财政支出偏倚	0.0307***	2.9511	0.0318***	3.0806	0.0352***	3.4851
财政支出结构改善	0.0102	1.0738				
对外开放程度	-0.0243**	-2.2443	-0.0234**	-2.1764	-0.0158*	-1.6546
城市化水平	-0.2073***	-7.6875	-0.2138***	-8.1593	-0.2212***	-8.5817
R ²	0.8410		0.8394		0.8372	
调整的R ²	0.8347		0.8340		0.8329	
F值	0		0			

注: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在这3个模型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城市化水平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均为负,财政支出偏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些都和预期一致。对外开放程度在3个模型中显著水平分别为5%、5%、10%,且系数为负。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在第1个模型中不显著,人均GDP在第2个模型显著性水平为12%,介于10%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水

平,可以考虑保留在模型中。在这3个模型中,各个变量的数字相差不大,符号保持一致,说明模型较为稳健。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促进作用。近年来,数字金融在我国飞速发展,使得面向普惠群体的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可行。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增强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并有效发挥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实现城乡包容性增长和共同富裕。

(一) 确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和总体思路

相较于传统银行网点,数字金融大大降低了普惠金融的经营成本,拓展了服务范围,提升了服务效率,易形成规模经济,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金融机构应及早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明晰总体发展思路,积极开拓市场份额,以占得先发优势并获得规模收益。在客户群体选择、网点布局、产品设计和营销策划遵循以下总体思路:基于普惠金融的服务宗旨,应将县域“三农”、低端社区居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主要客户群体;在网点布局上,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立体服务渠道,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代理网点的作用;在产品设计和营销策划上,针对不同的目标客户群体、网点布局,进行差异化“产品套餐”设计和针对性营销策划。

(二) 重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

在明确战略的基础上,围绕目标客户群体,重塑发展路径。(1) 依托数字金融+实体网点,重塑业务办理渠道,分别构建“村镇银行+数字金融”、“小微银行+数字金融”、“社区银行+数字金融”实体与数字渠道有机结合、三位一体的发展渠道。(2) 依托数字金融+普惠金融产品,重塑产品体系。分别结合“三农”、小微企业、低收入社区人群特征,推出与这三类群体密切相关的个性化数字金融产品,设计具有特色的数字金融产品套餐。(3) 面向数字普惠金融进行技术升级,重塑造技术支持路径。金融机构要主动利用互联网、移动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生物技术等新型数字技术,围绕普惠金融群体的业务需求、客户定位、风险控制问题,进入技术升级和创新。(4) 加强信息安全管理,重逆风险管理模式。安全顾虑是普惠金融群体使用数字金融的主要障碍之一,处理不当也是数字金融的重大缺陷。金融机构要注重普惠群体的安全体验,比如利用扫码支付、生物技术识别等现代化的数字技术,加强信息安全管理,解决普惠群体使用数字的后顾之忧。

(三) 打造多方合作与相互支持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圈

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整个金融生态圈建设。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兴互联网金融企业在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方面各有优劣势,因此,要相互支持和合

作。此外,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还要加强与数字金融产业圈和社交圈的合作,积极开展与通信运营商、设备供应商、第三方支付、电商等机构的跨界融合,共同打造一体化的数字金融生态圈。另一方面,要争取多方位的外部支持:完善数字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法制环境;争取各级政府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激励,降低金融机构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外部成本;完善普惠金融群体信用保障机制,缩小开展业务的信息不对称性;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提高数字技术覆盖率;加强数字金融知识教育,提高普惠金融群体对数字金融的认知程度,避免数字鸿沟的产生;加强网络支付安全保障,为普惠群体运用数字金融交易提供一个安全的交易环境。

(四) 积极发挥其他因素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作用

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并不会抑制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合理的政策支持会促进这一方面的积极作用。现阶段,农村外出打工者在城市生活的高昂费用、子女入学难、权利受限等都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因素。保障外出务工人员权利、鼓励在农村地区建厂、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发挥城市高新技术发展对农村一般工业产业的带动能力,都能有效促进这方面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

农村地区可以利用当地有利的环境、资源优势、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吸引外商在当地建厂,努力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找准机会、发展当地经济,并从中获益。政府一方面可以对外商企业在农村、低收入地区的设厂进行减税等政策上的扶持,另一方面应鼓励农村地区发挥自身优势,优化环境,给外商投资的进入提供便利条件。

财政支出内部结构仍有待优化,财政支出向城市的较大偏倚使农村居民从中获益依然较少。政府需要加大对支农财政支出的重视,支农财政支出的扩大不仅要体现在数字上,更要体现在具体用途、使用效率上,并在支农支出的具体分配、使用上发挥指导作用并对重点项目进行后续跟进。☆

注 释:

①篇幅所限,本文只简单介绍数字普惠金融的指标选取和指数编制,详见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5年)》,2016年7月。

主要参考文献:

- [1]McKinnon,Ronald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3.
- [2]Moran T P. Kuznets' s Inverted U-Curve Hypothesis: The Rise, Demise, and Continued Relevance of a Socioeconomic Law[J]. Sociological Forum, 2005, 20(2):209-244.
- [3]Greenwood J, Jovanovic B.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Volume 98, Number 5, Part 1):1076-1107.

- [4] Dollar D, Kraay A.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2, 7(3):195-225.
- [5] Geda A, Shimeles A, Zerfu D. Finance and Poverty in Ethiopia: A Household-Level Analysis[R]. Research Paper No 51,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2006.
- [6] Bittencourt M.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Brazil 1985-1994[J]. 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2010, 43(2):113-130.
- [7] Sarma M. 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J].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New Delhi Working Papers, 2010.
- [8] 徐敏, 张小林. 普惠制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J]. 金融论坛, 2014(9).
- [9] 王海军, 王念, 戴冠. “普惠”金融背景的互联网金融——理论解构与政策分析[J]. 上海金融学院学报, 2014(4).
- [10] 焦瑾璞, 黄亭亭, 汪天都, 张韶华, 王瑱.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及实证研究[J]. 上海金融, 2015(4).
- [11] 张晓燕.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 财会月刊, 2016(17).
- [12] 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5年), 2016-7.
- [13] 陆铭, 陈钊.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04(6).
- [14] 唐礼智, 刘喜好, 贾璇. 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11).
- [15] 胡荣才, 冯祖章.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J]. 中国软科学, 2011(2).
- [16] 王修华, 邱兆祥. 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J]. 经济学动态, 2011(2).
- [17] 胡晶晶, 黄浩. 二元经济结构、政府政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 财贸经济, 2013(4).
- [18] 薛宝贵, 何炼成. 市场竞争、金融排斥与城乡收入差距[J]. 财贸研究, 2016(1).
- [19] (美)安德森著, 乔江涛, 石晓燕译. 长尾理论:为什么商业的未来是小众市场[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 [20] 田杰, 陶建平. 农村金融排除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 中国经济问题, 2011(5).

Empirical Analysi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Bridging the Urban-rural Residents' Income Gap

Song Xiaoli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financial services, using Theil index to measure China's urban-rural residents' income gap, constructing panel data regression model,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urban and rural income gap.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ould bridge the urban-rural residents' income gap; an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fiscal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could also make effects significantly. It's proposed tha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stablish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overall developing thinking, and build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ecosyste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educ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Urban-Rural Residents' Income Gap; Panel Data Model

(责任编辑:陈健生)

收稿日期:2017-04-08